

← (上接12版)

费四千金，将运往定兴县纸坊重造纸料。’闻之大惊，乃定期约雪堂、沈鑫偕往同懋增，则谓车运造纸已过半矣。仅检留数袋立许五百金携归，并嘱速追余件，当三倍其原值酬之，往返兼旬，居然陆续运还。……此项库书为明清二代国故所关，幸得雪堂先生一人之力，初将销毁夺于火劫，终将造纸夺于水劫，殆有天意存乎。”而罗振玉设法从同懋增老板手中买回档案的过程，是由金梁具体出面洽谈，罗振玉背后出资，以金梁的名义购买下来的。

### 《清史稿》关内本与金梁关外本

1914年袁世凯正式颁发大总统令设置清史馆，众清遗民参与其间，借以“酬报故国，诛奸发潜”。1928年7月，《清史稿》全书告成，此书由黑龙江省出资协助出版，于1928年在北京首次印刷。刘成禺《清史稿之纂修与刊印》文中，称金梁为“此修印清史稿之幕中人物也”，并概述《清史稿》各版本：“《清史稿》印本有四：曰北京初印本，曰东三省改正本，曰东三省增修足印本，曰日本广岛精印本。”1928年的刊印工作，由袁金铠主持，金梁经办，袁因忙于政务，转托金梁负责校刻书稿。金梁利用负责刊印之便，按己意修改原稿，增补《张勋传》，附《张彪传》《康有为传》等，书后，又自撰附刊《清史稿校刻记》。书籍印成，共1100部。北京初印本，即《清史稿》关内本，为1928年印刷的1100部中留在关内的700部。当时清史馆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，当即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后重新发行，并删去了金梁所作的《清史稿校刻记》和其中的《张勋传》、附《张彪传》《康有为传》，改订了金梁在“清史馆题名”中擅加的称谓，删去了“易类”书目64种，抽换了《艺文志·序》，修改了《劳乃宣传》《沈曾植传》等个别传记。因此称为关内本。东三省改正本，即金梁运往奉天的400部。东三省增修足印本，又称关外二次本，是1937年金梁在关外本的基础上，亦删去《附·张彪传》《公主表·序》及《时宪志》中的“八线对数表”，增加了《陈黄举传》《朱筠传》《翁方纲传》，简化了《赵尔丰传》。后来日本人得到《清史稿》关外二次本，重新排印大字版，装订十函，并加入金梁的《清史稿校刻记》，是为广岛精印本。

### 四库全书

1919年金梁向时任大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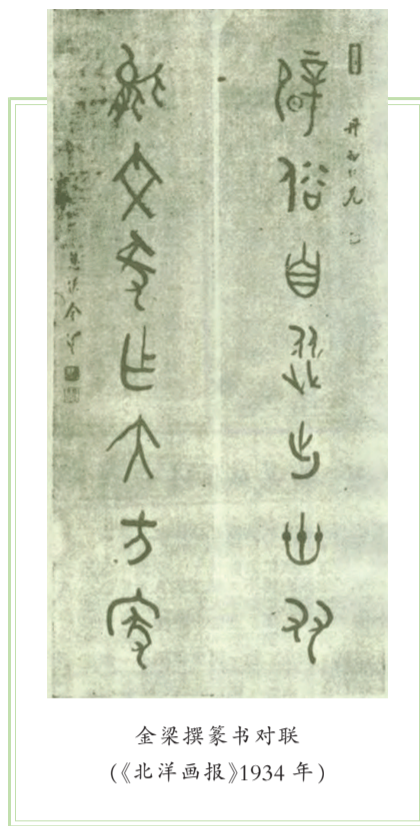
统徐世昌提请影印《四库全书》，1921年再次上书，请印《四库全书》，1924年初，金梁撰《四库全书纂修考跋》，重提影印事：“《四库全书》集古今学术之大成，一朝盛业中，古所未有也。……使中原文物照耀全球，此世界文化所关，亦吾国之光也。”此文刊载在1924年5月《东方杂志》21卷第9号，金毓黻称赞：“言之颇详，足备史乘。”1928年，金梁任奉天通志馆总纂期间，向省政府提出续修《四库全书目录》，并撰《四库全书目录续编序》《四库全书目录续编凡例》及《四库全书目录续编分类目录》，辑《四库全书孤本选目表》《四库全书校印记》。1931年4月30日，金梁与高闾仙、董重、金毓黻呼吁东北当局，刊印沈阳故宫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。1933年8月，金梁选印《四库全书》部分内容，刊载在《时事新报》上。今人评价金梁在刊印《四库全书》的贡献时说，金梁这些主张虽然都未能实行，却成为此后选印《四库全书》珍本的先声（《四库全书纂修研究》）。金梁还为征集《永乐大典》积极奔走；1924年5月，在内务府交接清查古物时，发现传世国宝青铜器散氏盘和且丁鼎，金梁立即邀请马衡、孙伯恒、陈准生一同鉴赏，大家合议摄影、作拓片进一步研究；1924年8月在上海与柯劭忞、辜鸿铭、陈三立、郑孝胥、王国维、罗振玉等20人共同发起成立东方学会。

### 清宗室史志

从1908年任职奉天开始，金梁就在留意和搜集清宗室王公的各种遗存。先后整理、编辑《宗室王公世爵袭次册跋》（1909）、《盛京故宫书画记》《奉天宫殿宝物图录》（1912）、《清帝后御笔书画真迹册》（1916）、《德宗景皇帝御制诗文稿本跋》《盛京故宫书画录》《大内库藏吉金目录》（1924）。1921、1922年，金梁两次向溥仪提议建立皇室博物馆，并作了很详细的《皇室博物馆条约》，1928年12月5日，在张学良建议下，奉天省长翟文选下聘书聘请金梁任东三省博物馆委员长，金梁以奉天故宫为依托，改组机构，清查古物，改造陈列设施，“发扬国故，沧进文明”。

### 龙江史地

1914年冬，金梁在《盛京时报》连载奉天古迹考证文章，集成1卷，名曰“奉天古迹考”，铅字排印，由奉天作新印刷局出版发行。1916年，以奉天财政厅厅长名义，通令各县，编乡土志，后得四十余县所编乡土志，撰《奉天乡土志叙例》。1919年



金梁撰篆书对联  
（《北洋画报》1934年）

始，金梁开始收集黑龙江方志，至1924年，积方志史稿百余箱，充满数屋。1925年5月，辑成《黑龙江通志稿》，“余别满洲久矣，白山黑水，徒劳梦想，而龙江故实，日事编摩，尤念念不忘”。1928年11月17日，奉天通志馆正式成立，金梁、王树枏、金毓黻等任总纂，1934年10月，《奉天通志》成书刊行。

上列金梁在抗战前的主要著述，可以看到明显的“满洲”与“清室”印迹。这中间还包括他自晚清任奉天旗务处总办期间，便着手创办的各类迁旗殖边、筹备八旗生计等事，“为边疆谋开辟，并为满洲固根本”。在以个人行为修订《清史稿》时，将自己撰写的英华（英敛之）、震钧及祖父观成的事迹，置入列传，并撰写《清史太祖本记赞》《清史圣祖本记赞》《清史世宗本记赞》《清史宣统本记赞》等；收集清代帝后御笔书画，“此当藏之家庙、传之后世，不得视同寻常书画，凡我子子孙孙其永宝之”。联想到萌昌当了北洋的官，代表民国政府入紫禁城致贺溥仪大婚，代表完民国，又代表自己跪下，自称“奴才”，给皇上行礼。不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称呼，这代表了一个族群世系。金梁也在这个世系当中，他的民国岁月，书写，奔走，除了忠王朝体制、“中国文化”，还包括忠于清室，秉笔俯仰山川，念念不忘白山黑水。

\* \* \*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势力直入东北，“满洲国”呼之欲出，旧日好友同僚郑孝胥、袁金铠、罗振玉、宝熙、三多等人纷

纷驰驱“王道乐土”。金梁则携家眷离沈赴津，从此“闭门养病，不问世事。”1932年，《申报》上登“金息侯先生鬻书文”：“金息侯先生梁，自去秋沈变，即携眷避津，鬻文为活，不问人事，即未卖国，亦不卖主，立身自有本末，不辨自明。”金毓黻评价他：“先生素以清室遗臣自命，而未肯受伪命，亦至不易。”再看他的晚年著述，1933年秋，根据早年日记，“择有关朝

章国故者撮录成编”，出版《光宣小记》；1933年12月，辑《清官史略》，主要内容为清官礼仪、宫殿、宫规、宫制、典籍、书画等史事；1934年春，自行刊印线装铅印本《清帝外纪》1卷，《清后外传》1卷；1934年5月，撰《重印文苑传叙》，补俞樾、王闿运、王先谦、郑杲等传；1934年10月，自行刊印《光宣传列》，全书共6册，41卷，系自《清史稿》抽印；1934年12月，汇钞《翁文恭公日记》《湘绮楼日记》《缘督庐日记》《越缦堂日记》四部日记，仅取其中论人部分，剪裁成传，前后贯串，辑成《近世人物志》，凡六百人，郑逸梅评价“虽述而不作，在文史上是有相当贡献的”；1935年5月初，出版第三版《瓜圃丛刊叙录》；1935年6月，撰《重印忠孝义传叙》，亦为《清史稿》脱胎、增补而来，“意在提倡中国固有之道德”；1936年初，开始着手整理清史资料，准备写一部《清通鉴》；1936年，撰《四朝佚闻》2卷1册，述咸、同、光、宣四朝轶闻佚事。所述、著作，皆为胜朝遗事。

此后全面抗战爆发，他在天津做寓公，主持“俦社”，诗酒自娱，已基本不再著述。依然对比沈曾植、陈三立，金梁是清遗民群类中相当积极入世的那一类，而他守的，并不是广义的中国，是立身于清朝的那个中国，他的“国故”，是弥散的清帝、后之国之故。因为人高调张扬，讥评也很多，习惯向遗老遗少们飞白眼的鲁迅先生就点过金梁的名，“凡有民国所做的事，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。”主持所译满文老档，疏漏错谬颇多，孟森评之曰：“窃取《东华录》，做伪欺人。”有人指其任东三省博物馆委员会，清查文物为名，

“内府图章盗已空，又来关外管皇宫。小胡见客直是缚，顶到亡清以后红。”因小朝廷事，罗振玉、郑孝胥交恶，金梁瓜葛到龃龉，直接被罗继祖回忆成“这个人很无聊”“很好出风头”“是个十足的政客，但手腕并不高”。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还有一幅金梁小像：“（1925年）旧历元旦那天，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。那天有段插曲值得一提。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，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号，把人们都吓了一跳，接着，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，边号边走，夺门而出。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，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。有人认出这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，他干号什么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到第二天，《顺天时报》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，人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，是为了写这首诗而做的苦心准备。”

遗民行止，有许多仪式性、表演性成份，例如凭栏、泣血等等意象的营造与反复述说，金梁大概算是更加典型的“戏剧人”。但我们看一个人，也不能就此顺势讥评。他的人世，有戏剧，亦有真实的用世之心。相比于袖手谈心性，他是一个实干派，愿意做事。这份用世之心，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，人生还有一笔收梢。1950年，由天津迁居北京，在国家文物局任顾问，开始撰写北京地方掌故及地方名胜志略，以七十五高龄撰著《三坛》《大北京》《雍和宫》，1953年，金梁将所撰《天坛志略》《雍和宫志》自行刊印。1954年，“一定要解放台湾”号令下，金梁开始查阅台湾地区历史资料，着手撰写《台湾史料》，次年稿成，自行油印线装成书，分送各地图书馆。1956年在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鼓舞下，投入清史整理工作。八十高龄，写下“故京文物依然孤，草木欣欣向阳春。春色满园齐解放，天平来会天平父”的诗句。

书写还原到生命语境之内，连同他一生的经历，我们看到，作为清遗民，他有拒绝的姿态，但并不像鲁迅先生讲的，凡民国皆可恶。他与胡汉民、汤化龙、谭延闿为同科进士，虽为遗老但并不寇仇革命，称他们为“革命三同年”：汤化龙厚重，谭延闿宽和，胡汉民坚卓，皆有不可及处。他想要保留的是他心目中的“王道”与“国故”。在1919的风云中热烈希冀未来的，却有许多人在此后岁月失望、折戟、消隐，遗臣金梁则迎来了更新、更激昂的世代。

（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）